

布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郑 震

摘 要 布希亚以符号统治为视角深刻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建构起一种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理论。布希亚对启蒙的参照理性和现代主体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批判在清算前者的先验主义、绝对主义以及意识哲学等消极特征的同时,错误地走到了另一极。在布希亚的批判理论中依然可见客体主义的偏见、文化主义的霸权、极端相对主义的怀疑论以及实在论的残余等等,深入反思和批判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合理地认知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

关键词 布希亚 消费社会 符号

法国社会理论家让·布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了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视角掺杂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拒绝的复杂态度,受到其师列斐伏尔的生活批判理论的深刻影响,并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被打上了尼采和巴塔耶式的贵族批判的烙印^①。布希亚显然被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消费主义潮流所吸引,这使他投身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研究,本文即是对这一批判的批判性研究。

布希亚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已无法克服,因为“它就是市场社会的结构本身”,消费的时代是一个彻底异化的时代,商品的逻辑已经普遍化并统治了一切^②。这一总体化的状态意味着不再有对主体或自我同一性这样的本真状态的意识形态想象的空间,因此,严格地说,也就没有了那种作

为意识形态想象的本真状态的异化可言^③。因为使异化得以可能的那个非异化的理性的现代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它彻底被符号的组合与计算所吸收和消解。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阶段之前的工业化阶段中,有关人的先验主体性及其异化的思想就是客观的事实,那不过是生产秩序所创造的神话,而是指对于消费的形而上学而言,尚未找到与之等价的神话^④。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商品的符号逻辑已经构成了一种总体化的统治,一切都是符号或者说符号化了的商品文化的建构,超越消失在符

① 凯尔纳:《让·鲍德里亚》,凌琪等译,载乔治·瑞泽尔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40 页。

②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190, 191.

③ Ibid., p. 192.

④ Ibid., p. 193.

号的安排之中,而谈论与超越不可分割的神话也就失去了意义。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异化由于其对立面的消失而转变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非异化,布希亚所谈论的符号统治也并不因为其总体化的异化状态而转化为自然的真实。事实上,当布希亚谈论所谓的消费的形而上学时,他已经充分地暗示了消费并不具有什么本真的属性。相反,布希亚认为消费也是一个神话,这当然不是与工业化时代的异化神话等价的,而是一种将一切有关消费的反话语都加以吸收的总体化的神话^①。消费社会的总体性的神话取代了工业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从“佯装不知什么”的符号向“佯装不知什么也没有”的符号的转变^②。前一时代依然承认真实和虚假的区分是有意义的,所以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符号才会佯装不知对真实的掩盖;而在后一时代中,区分现实与想象的标准已经彻底丧失,因此符号才会佯装不知其实什么都没有。这是从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存在的时代向现实被彻底消解的时代的转变,后者意味着消费的统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观念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唯一客观的消费现实是消费的观念”^③,消费社会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存在的。消费社会就其实质而言也只是一种消费的观念,所以布希亚宣称消费社会正在成为它自己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因为人们相信存在着所谓的消费社会,人们才不断地去实现消费社会的观念,而消费社会也正因此而存在。人们所追求的正是他们自身的形象,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这是一种同语反复,而消费社会正是这种自我实现预言式的社会,除了人们的信仰之外,它什么都不是^④。

对布希亚而言,消费符号是现代模拟物(simulacra)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他认为现代模拟物的发展经历了三个秩序阶段或三种价值形态,它们依次为价值的自然规律(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仿造阶段)、价值的商品或市场规律(工业化时期的生产阶段)、价值的结构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当代的模拟阶段)。每一个更高的价值形态都将前一个形态吸收进来,将其作为自身进行模拟的参照系统,不过被吸收和参照的形态已经失去了严格的规定性^⑤。布希亚认为,文艺复兴之前的由互惠的责任加以约束的非任意的象征性符号构成了

一种“自然”,而模拟物的第一个秩序阶段的现代符号则通过仿造这一自然而获得其价值。工业革命的来到则清除了仿造所承认的现实,它用大规模复制的产品取代了仿造品,用工业化生产系统的现实取代了原初的现实,因为对产品而言不再有所谓的仿造的原件,同一系列中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其他产品的无差别的模拟物,工业化生产的现实不再有原初的参照物。正是原始参照的消失使生产得以可能^⑥。不过生产阶段的模拟物依然创造了它自己的现实,统治这一时期的原则依然是现实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神话学依然具有意义,对那个派生现实的掩盖构成了这一时期符号欺骗的特征。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时代,它宣扬启蒙的理性,崇尚对现实的参照,强调历史的意义和目标,信奉主体的价值,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觉,因为真正的现实已被消除,生产已被机械复制时代的再生产所吸收,生产本身不过是在重复产品的系列,以至于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和目标可言。这是一个技术作为媒介(而非作为生产力)获得了对产品的信息(它的使用价值)和劳动力的控制的时代。

不过工业化时期是短暂的、过渡性的,工业化只是现代模拟(simulation)的最初形式^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依据模型(参照的能指)所进行的再生产取代了系列的再生产的基础地位,这意味着一个由符号的编码规则统治的时代最终到来。它不再专注于对意识的欺骗,而是热衷于对无意识的训练,通过对无意识的话语建构将无意识转化为一种操作性的模拟物,从而使人们在编码的层面展开竞争性的合作,其实质就是盲目地遵循符号的差异逻辑。

①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p. 195, 196.

② J. Baudrillar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0.

③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193.

④ Ibid., p. 194.

⑤ J.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lated by L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 2.

⑥ Ibid., p. 55.

⑦ Ibid., p. 56.

辑(即社会分化或者说等级区分),在符号的游戏中随波逐流。然而符号的编码逻辑并不代表什么本真的现实,它用编码所生产的新的现实取代了工业化时代的现实,其实质不过是参照维度的彻底消失。这个新的现实完全是符号的建构,它的意义来自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非对现实的参照,它的再生产所遵循的是符号建构的模型,唯一的参照就是模型这一当代文化或符号的建构。布希亚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有关符号的任意性和意义的差异理论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历史性的符号关系系统,并不需要在它之外还有什么它不能还原的真实来支撑它的存在,一切都是符号自身或者说能指的游戏,而所指充其量不过是能指所虚构出来的一个任意的人造物,它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它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虚构^①。就此而言,进一步区分所指及其参照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它们统统消失在能指的阴影之中。由此,布希亚宣称“自然已死”,那个假定了客观存在的真实需求,并在客观的生产和主体的需求的辩证法中开拓思路的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也已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价值的领域中随意变换着的模拟的模型。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获得了理论代言人,伴随着参照物的消失,在真实与虚假、现实与想象、理性与非理性、生产与消费等等之间的传统的对立和差异被彻底超越了,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上的客观的标准,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替换。符号终于挣脱了所有现实的束缚,这是价值的革命,当价值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自主性的同时,现实已死,确定性已死^②。

就此,布希亚宣称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一个由模拟原则所统治的社会,现实原则业已过时,现实已经被编码和模拟的超级现实(hyperreality)所吸收^③。之所以说是超级现实,就在于模拟不再以现实为参照,“它是由没有起源或实在的一个现实的模型所生成的:一个超级现实”^④。它完全处于模拟之中,从而不再遵循再现的逻辑,它是没有原本的复本,并且总已经是复本^⑤。超级的现实是符号所编码的现实,它就是消费时代的现实本身,因此今天“现实本身是超级现实主义的”。就此而言,超级现实并不是非现实,尽管它的确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它超越了现实和非现实的对立,作为能指的空洞形式,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真实和虚假的逻辑。

对于超级现实而言,在传统的意义上追问它是否真实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定要这么问,那么它也只是为了包含它并赋予它意义的符号系统而言才是“真实的”,但这个“真实”正因为没有虚假的对立面而自我否定了其真实的身份。布希亚写道:“当今的每一天,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等现实已经接纳了模拟的超级现实主义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现实的‘审美的’幻觉之中。”^⑥而这一论断所揭示的恰恰是布希亚自身理论阐述的美学化倾向,他以此来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思路^⑦。

事实上,在模拟原则统治的时代,模型作为唯一可能的参照,显示了由元语言所建构的充满了任意性的参照的幻觉。系统的编码所制造的不过是文化的幻觉,当这一幻觉成为统治一切的总体性话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没有现实的现实本身(超级现实),没有真实的真实本身(超级真实),于是它仿佛比真实更为真实。因为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真实还始终面临着对其真实身份的挑战和质疑,那么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真实”将成为一种绝对的真实,但也因此暴露了它作为绝对幻觉的实质。对于超级现实而言,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的传统对立被彻底消除了,现实本身沦为了符号的想象,不再有关于现实的虚构,因为没有与这一虚构相对应的真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立场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布希亚抛出了一系列有关终结的论断,包括生产的终结、劳动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革命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等。在此我们只在总体上指出布希亚的这些论断所蕴含的基本立场,它由两个彼此关联的方面构成。一方面,在一个由符号的价值彻底统治的时代,不再有最终的标准来划分事实的界限,由此传统的对立面之间可以相互替换,这意味着原本正是凭借和对立面之间

① J.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lated by Charles Levin, Telos Press, 1981, p. 196.

② J.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p. 7.

③ Ibid., p. 2.

④ J. Baudrillar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 166.

⑤ J.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p. 73.

⑥ Ibid., p. 74.

⑦ 甘恩:《法国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的关系而获得自身同一性的现象失去了这种条件,以至于它不再能够与其原先的对立面区分开来,它们彼此相互替换,从而彻底取消了各自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即是超越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一个由编码统治的时代,超越的可能性让位给系统的再生产,不再有变革的目标和超越现状的可能性,这正是符号秩序的总体化统治的特征所在。

不可否认,布希亚以现代性的主流思想为靶子展开的智力活动的确显示了若干思路的转向,他以十分极端的方式把启蒙的相对主义潜力转化为一系列理论的方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希亚与主流现代性的思想传统彻底拉开了距离。他有关生产终结的一系列论断,其实质不过是将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化的悲观预言加以彻底实现,正因为生产的工具理性化的组织和计算已经总体化为无所不在的现实(至少布希亚是这么认为的),生产和劳动才最终迈向了终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理性化的进程在布希亚的笔下最终却是通过符号的编码系统这一非理性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艺术的终结揭示了这一进程相对于工具理性的非理性实质,丧失了超越和批判潜能的艺术已无所不在,其结果就是现实本身转化为审美的幻觉。这一思路显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形式理性化的实质的非理性所做出的批判。此外,尽管布希亚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论问题同样置入其对立面彼此替代的方案之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布希亚思想的方法论立场显然是一种客体主义式的还原论,这使他无法在这方面超越笛卡尔主义传统,尽管他对客体的理解颠覆了这一传统的实在论立场^①。

二

在布希亚的本体论范畴中根本没有主体的地位,消费个体与符号秩序的关系完全被一种客体主义的氛围所笼罩,“他并没有被反映在那个秩序中,而是被吸收和废除。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②。对布希亚而言,个体完全不是符号系统的手,他充其量只是这一系统所主导的游戏中的一个工具或中介。虽然如果没有人类行动者的存在,符号的存在将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符号的存在却在逻辑上决定了个体的生存,以至于个体完全被符号的系统所吸收和操纵。他的需要、他的形象、他的劳动及其产品都只不过是这一无所不

在的符号秩序所经营的巨大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它们在符号战略的精心计算中充当着系统在符号的差异中所生产的意义的载体,除此之外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此种符号的总体性支配中,不再有向本真存在的超越和历史变革的目标,不再能够在一种对最终结局的期待中来批判现实的荒谬,因为这个总体性的恐怖以一种单向度的方式彻底废黜了反思和超越的可能性,一切都只能在依据模型所展开的再生产中重复符号的超级真实,而个体则只能在无意识的黑夜中随波逐流^③。布希亚宣称在消费社会中不再可能有异端邪说^④,因为这个社会正在制造和操纵它自己的异端邪说,并由此来再生产它自身的存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希亚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的逻辑和列斐伏尔的恐怖主义社会的论断发展到了极致,也正因如此,当他试图寻找超越之路时,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自相矛盾之中。

布希亚宣称,在消费社会中那个宣扬个体自主性和自我固有价值个人原则被个体化(personalization)的编码所取代,这一编码并不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先验的主体性,它并不被任何个体所拥有,它只是在个体与他人的所指关系中穿过每个个体,从而在一种永恒的循环中被标记为理性的、分解的和可变的^⑤。因此工具理性化的、历史的个人取代了绝对的先验主体,个体仅仅存在于由编码所规定的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是霸权的能指对所指的建构,而在个体的存在中已预设了他人的内在性,就如同在他人的存在中也已预设了“我”的存在,但无论是

① 布希亚认为消费秩序的存在仅仅以人们的信仰为中介,但是它并不是观念的实体,它并没有被赋予一种本质主义的特征,也没有被强加于某种物的比喻,它自身的存在不过是和想象、幻觉、不确定性、随意性、无参照性以及关系性等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②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192.

③ 也正因此,消费的维度是误识(misrecognition)的维度(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34)。正是无意识所生产的误识以其似乎胸有成竹的了解屏蔽了反思性认识的可能性,符号的真实在无意识的盲从中被隐去,剩下的不过是误识的自以为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误识视为对现象学所谓的自然态度的一种批判性的解释)。

④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196.

⑤ Ibid., p. 170.

“我”还是他人都不是这个存在的主人。海德格尔笔下的非本真的常人概念在此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复活。布希亚眼中的消费是一个确保了符号秩序和群体整合的系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消费的系统完全凌驾于个体之上,并通过一种无意识的社会约束而将自身强加于个体^①。个人及其需要完全是消费系统的产物,是能指的结构所派生的效应。在《消费社会》中,布希亚宣称消费者的需要和满足不过是生产系统所制造和需求的的生产力,而当布希亚实现了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向之后,需要及其满足的生产价值则最终由消费的编码系统所决定。尽管布希亚的思想经历了这种转向(列斐伏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将消费个体视为一种消极的和派生的社会建构的立场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这种客体主义的立场源于结构主义在其消费社会理论中的强大影响^②。

正是在此种完全无视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特征的客体主义视角下,布希亚主张消费不过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因素,它贪婪地渴望着更大的官僚主义制约,而后者却被美化为自由的领域,人们无法逃脱这一恶性循环^③。这里毫无疑问地引出了有关权力的问题。在符号与权力的关系中,布希亚显然侧重于符号的方面,不是权力生产符号并通过符号来发挥作用,而是符号的编码系统生产了权力。这不再是福柯笔下的权力,而是漂浮在不确定的符号流中的死权力^④。布希亚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的本质是二元的逻辑,而现代性及其二元论只不过是编码而已^⑤。权力正是来自于并建立在此种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⑥。布希亚认为,与二元划分相伴随的是对对立面的想象,于是在人与自然的划分中,人想象自然的现实;在男人与女人的划分中,男人和女人彼此想象对方的现实;在第三世界和西方的划分中,它们各自的现实在对方的想象中被创造出来;如此等等。与此同时,权力和社会的优越性最为清晰地标记在想象中^⑦,如果没有二元的分裂和对差异的想象(其实质是符号的社会历史建构),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社会的优越性和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就此而言,权力的实质是符号的社会统治力量,这是符号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代表并维护着它自己的符号,而符号的总体性统治则暗示了权力的总体性。就像民意测验所表明的那样,系统给出了问题,由问题又

导出了系统事先指定的答案,这种问与答的模拟游戏暗示了权力的恶性循环^⑧。

到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布希亚对他所谓的模拟物的生产阶段和模拟阶段的划分是十分成问题的。他将生产阶段视为一个在意识层面展开的意识形态统治的阶段,这一统治所试图掩盖的是没有了原始参照的派生的现实(如劳动、机器以及整个工业化的生产系统),因为生产阶段的模拟物已经吸收或清除了前一阶段所肯定的现实^⑨,也就是说,统治这一阶段的现实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想象。这意味着标记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统治试图掩盖的不过是想象而已,意识形态理论不过是对想象的想象,那么以意识形态统治来描绘生产阶段充其量就是以一个个时代的理论幻觉来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就此布希亚将自己的理论置于自相矛盾的荒谬境地。换句话说,对布希亚而言,意识形态概念及其相关的意识哲学并没有能够把握到生产阶段中现实已经被清除的事实,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拒绝采用这样的理论来界定生产时代,但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考虑布希亚所主张的现实被消除的极端立场,而仅就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来看,应当说无意识概念之所以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意识到传统的意识哲学过分夸大了意识层面的重要性,而意识形态概念正是一种基于意识哲学的概念设计。这表明无论布希亚有关生产阶段的现实问题的判断是否合适,意识形态概念的确应当被修正。这就意味着,像布希亚那样堂而皇之地以意识机器来对应生产时代的工业机器,其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对意识哲学的妥协,从而将一个时代的错觉错当成

①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78.

② G. Ritzer, "Introduction", i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6.

③ J.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p. 84.

④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⑤ Ibid., pp. 86, 90.

⑥ Ibid., p. 30.

⑦ Ibid., p. 129.

⑧ Ibid., pp. 62, 67.

⑨ Ibid., p. 54.

一个时代的标志(而有趣的是,他甚至已经从他自己的成问题的理由出发批评了这一错觉)。由此可见,与其说布希亚是在对不同的历史时代进行划分,还不如说他是在划分不同时代的理论,无论是他将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意识联系起来,还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无意识联系起来,都只不过是迎合了特定时代的学术旨趣。我们不认为这一从模拟物的意识战略到无意识战略的转变有什么充分的历史根据,也不认为无意识问题在生产阶段就不具有基础的地位。

除此之外,仅就布希亚对这两个时代的描述而言,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布希亚认为生产时代是短暂且过渡性的,它已经处于模拟阶段的边界之上,工业化是模拟的最初形式。这种含混恰恰暴露了布希亚在时代划分上的问题,因为在他的笔下,生产阶段与模拟阶段的根本差别仅仅在于前者依然抱有各种幻想,从而想象诸如理性、主体、现实、历史的目标等等因素的存在,而后者则是连想象的余地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与其说是差别,不如说是将同一个逻辑推向极致,即从假装相信想象到承认想象不过只是想象而已(因此也就不再可能进行类似的想象),前者并不比后者有更多的实质,后者比前者所缺少的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可能性而已。究其根本,正是布希亚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极端相对主义和文化主义在其现代性批判的构思中发挥着消极作用,使布希亚不能从不同时代现实本身的独特方面出发来进行有效的时代划分。相反,他从一种对前现代的“怀乡病”出发,武断地主张现代性不过是模拟物的逻辑向极端发展的过程,而生产阶段和模拟阶段则是这一发展彻底摆脱前现代社会的束缚,从而进入到一种由现代性的模拟文化加以统治的时代,而作为模拟物的第三秩序的模拟阶段则是这一统治走向极致的表现。

我们并不否认布希亚对启蒙的参照理性和现代主体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批判在清算前者的先验主义、绝对主义以及意识哲学等消极特征的同时,却错误地走到了另一极。他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怀乡病”式的偏执和对于现代性的极端文化主义立场,使他无法接受一种包含着人类价值创造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现实概念,使他无法正视工业化所创造的现实并不比前现代的世界更少

现实性,而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信息化的符号网络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超级现实的无所顾忌和任意武断。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否认布希亚的现代性批判在一种有所节制的意义上是颇具启发性的,但是他的极端发挥则将其思想引入歧途,他那彻底否认主体地位的客体主义立场使他笔下的社会秩序的变革只能荒谬地呈现为一种被人人格化了的客体的游戏,他对历史的划分往往显得武断且充满矛盾,此外,他在认识论上更是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应该说布希亚更多地只是看到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消极方面,他将深刻影响了他的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推向了极致,从而将意义仅仅归为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由此排除了意义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将符号的任意性这一索绪尔的古老话题放大为一种彻底的文化相对主义。但与此同时,他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前现代的论域中则被一种关于人性的实在论倾向占了上风^①,这一矛盾的状态只能是一种对于前现代象征文化的过于乐观的想象的结果。在此布希亚又一次落入他所批判的现代性的二元论陷阱之中,他正是在前现代与现代、象征与符号的二元划分中想象着对现代性的超越(即以所谓的前现代的象征逻辑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逻辑),而这与他符号统治的总体化判断又是相矛盾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众消费行为的符号化倾向研究”(项目编号:13CSH05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郑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唐静

^① 关于这一人性的假设可参见凯尔纳《让·鲍德里亚》,第739~740页。然而由这一假设所支撑的异化批判理论显然是缺乏经验根据的,它具有某种实在论的残余。